

批评话语分析的意识形态观述评

赖良涛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40)

摘 要: 意识形态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关注焦点和成果深刻性的根源。从 Fowler、Wodak、Fairclough、van Dijk 等批评话语分析代表性学者的意识形态观入手,对其内涵、与话语关系和与社会结构关系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比较其异同和利弊,最终得出批评话语分析的总体意识形态观。研究发现,在批评话语分析中,意识形态是社会群体认知所形成的深层次信念体系,建构着社会群体的主体性身份,具有一定的图式结构,兼具相对稳定性、连贯性以及内部差异性和可变性,并以社会效应而非真理性为判断标准;意识形态形成、体现于社会群体的话语活动中,又制约着群体的话语活动;它与社会结构、特别是权力结构互相建构,是社会权力形成与管控的重要方式。但目前的研究存在意识形态的判定标准仍然不够明确,对显性的意识形态关注不够,以及对个体成员的价值观念在群体意识形态中的功能角色认识不清等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探索。

关键词: 批评话语分析; 社会结构; 意识形态观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321(2018)04-0060-07

批评话语分析,又叫批评话语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是通过话语分析的手段来揭示社会不公及其背后隐含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学科领域。对话语背后意识形态的揭示和批判是批评话语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其研究成果具有社会深刻性的主要根源。然而,在批评话语研究中,不同的流派、学者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却不尽相同,从而使得这个关键术语的使用充满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本文基于批评话语研究代表性人物 Fowler、Wodak、Fairclough、van Dijk 的相关著述,比较各主要学者对意识形态的阐述,从意识形态的内涵以及与话语的关系和其与社会的关系等三个层面,找出各派的异同和利弊,取长补短加以综合,得出批评话语分析总体的意识形态观。

一、Fowler 的意识形态观

意识形态是 Fowler 的批评语言学的一个核心概念。Fowler^[1]认为意识形态与人们组织和解释

其生活的方式相关,并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人们生活的方式以及人们对其与其生存条件之间关系的自我表征方式的总和。这个定义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即意识形态既是人们生活的方式,也是人们对其生活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解释的方式。Fowler^[2]把意识形态(ideology)定义为一个社会中一套隐形的、关于其世界中所存在的对象类型(范畴化)、世界运作方式(因果律)以及被赋予对象和过程的价值观念(一般观点或范式)的理论。这个定义与前一定义相比,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被进一步细化,即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特定社会群体如何把客观对象范畴化,即如何把世界中的客观对象通过认知活动变成一个个概念范畴;二是世界中客观对象的运动过程,即该社会群体对世界中的各运动过程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识;三是社会群体赋予这些概念范畴和运动过程的价值观念。(2)这个定

收稿日期: 2018-03-09

作者简介: 赖良涛,男,江西赣州人,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

义中没有关于人们生活方式的表述,而是强调人们对其所生活世界的认知与解释。(3)意识形态表现为特定社会群体的一整套深刻的理论,是系统的、社会的,而不是零散的、个人的。(4)Fowler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隐形性,即意识形态不是明显的、一目了然的,而是隐藏于人们的生活背后。另外,Fowler^[3]认为,意识形态是中性的,并不含有任何的贬义,不是指某些错误、扭曲的思想意识。总的来说,根据Fowler的观点,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群体对于其世界中客观对象及其运作方式的认知及其他所赋予的价值观念,是具有系统性、社会性、隐形性和规范性特征。

关于意识形态与话语的关系,Fowler^[4]认为,意识形态作为隐形的信念构成了该社会的常识(common sense),并为社会话语提供了一个规范性的基础。这意味着意识形态被社会群体的成员普遍接受,并在其社会生活实践中普遍遵守,从而反过来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具有规范、制约作用。Fowler引用Kress^[5]的后现代主义话语观,强调话语的文化潜能性、对具体社会实践的制约性和对主体的建构性,认为话语是表达某一社会机构的意义和价值观的、具有系统性组织的表述集;话语就某个领域提供一套可能的表述,定义、描述并限定了社会结构所关注的领域中可能和不可能表达的内容,并对某个具体的话题、对象、过程的谈论方式加以组织,赋予其结构;话语是存在于文化中的意义系统,先于语言而存在。Fowler^[6]认为作者和读者正是由他们所能接触到的话语构成的。具体来说,作者正是从其所可用的话语中创造出语篇,因而是社会文化的构成体;作者创造出的语篇为读者提供了阅读立场,即指出哪些是读者可以带到语篇中的恰当的意识形态信息。然而读者也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在接触语篇之前就具备了相关的话语信息,由此在阅读过程中把语篇重构为一个意义系统,而这个重构的意义系统可能和作者在创造语篇中所带入的意识形态一致或相悖。因而作者和读者之间创造和消费语篇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在话语实践中施加其具体规范性影响的过程。总之,在Fowler看来,意识形态作为规范性的社会常识,制约着话语实践,从而对具体的语篇建构具有制约作用,即规定了语言可以表述的内容、策略、方式、结构,并同时建构了语篇的作者和读者,使得作者和读者的意识形态得以互动。

从Fowler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可以看出,他认为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是辩证、双向的。一方面,意识形态是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即社会群体对于其所生活中的事物现象(包括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认知及其价值赋值,因而它依赖于社会群体,是对社会结构的反映;另一方面,一旦意识形态形成,它也对社会群体的生活实践具有建构作用,表现为指导、规范群体成员的社会实践,从而进一步巩固已有的社会结构。在Fowler看来,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社会的权力地位结构,因而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结构之间同样存在着辩证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即意识形态一方面反映着社会的权力结构,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权力关系的调节器,对社会权力结构具有建构、巩固作用。Fowler^[7]指出,批评语言学的目标就是要揭示社会权力不平等,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形制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及其变迁。

二、Wodak的意识形态观

Wodak^[8]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社会形态和过程,由此社会的符号形态得以在社会世界中传递,研究意识形态就是要研究通过各种符号形态来建构和传递意义的方式,同时也要研究这些符号形态被使用时所处的社会语境。Wodak^[9]又指出,从其话语历史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的视角来看,意识形态指一种常常是偏见性的视角或世界观,包括一些相关联的心理表征、信念、观点、态度和评价,并且为特定社会群体中的成员所共享。Wodak & Meyer^[10]指出,政治学中意识形态的核心内涵是一套连贯的、相对稳定的信念或价值观念,对意识形态不能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去理解,即不能把意识形态归咎为某种扭曲化的过程。与Fowler类似,Wodak认为意识形态是对世界的认知、解释和价值观,强调意识形态的社会群体性、逻辑连贯性;但她没有对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做深入细致的分析,而更加强调意识形态的符号建构性;同时她虽然和Fowler一样,认为不能把意识形态归结为扭曲、偏见的,但她更为关注那些偏见性的意识形态。

关于意识形态与话语的关系,Wodak^[11]指出,在各具体语篇中通过意识形态斗争所建立起来的控制支配关系就是权力;权力关系的合法化与非法化是在话语中完成的;语篇常常是进行社会斗争的场所,因为语篇常常体现着各种为争夺控制和霸权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也就是说,各种

意识形态渗透于语篇与话语的具体过程中,对话篇和话语的建构起着制约作用,这和 Fowler 的观点基本一致;但与 Fowler 单纯强调意识形态对话篇的规范作用相比,Wodak 强调语篇和话语既是各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目标,而 Fowler 则指出意识形态在语篇中斗争的途径,即通过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价值观互动来完成。在话语观上,Wodak 强调话语的符号性、语境依赖性、社会建构性和结构潜能,认为话语是一系列处于特定社会活动领域之中依赖于具体语境的符号实践,社会活动领域定义为建构和塑造着话语框架的各社会现实的切分段;话语是由社会建构的并对社会有建构作用,和某一宏观话题相关,并与特定有效性断言的论辩(其中涉及观点各异的多个社会活动者)相关;^{[12][13]}认为话语理解是对社会生活发挥组织结构作用的相对稳定的语言使用方式,是具有结构形式的知识(as structured forms of knowledge),语篇是话语的具体体现。^[14]

关于意识形态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与 Fowler 强调两者之间的辩证作用与反作用关系相比,Wodak 更为注重揭示意识形态斗争如何导致各种权力支配关系。Wodak^[15]认为,在具体语篇中通过意识形态斗争所建立起来的控制支配关系就是权力,意识形态是一种十分重要的通过话语来建立和维护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手段。Wodak & Meyer^[16]指出,意识形态对认知有控制作用,可以引导个体的评价,其引导作用通过社会活动(即话语)发挥作用。Wodak 所感兴趣的不是处于文化表面的显性意识形态,而是那种内在于日常信念中更为隐蔽的潜伏似的意识形态,因而她特别重视揭示意识形态的隐蔽性、中性化及其导致的霸权。她指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以中性的面貌出现,并与一些通常不受质疑的日常假设相联系;当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对于某些事情持有相类似的想法,甚至于忘却了与当前状态的相异的其它可能的观念或想法时,我们就陷入了葛兰西式的霸权状态,并由此通过建立霸权性身份叙事或控制具体话语和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的使用权来维护不平等权力。总之,Wodak 注重披露意识形态的中性化、自然化、常识化的神秘面纱,并揭示意识形态在话语中建立和维护各种不平等权力支配关系的具体方式。

三、Fairclough 的意识形态观

Fairclough^[17]强调把意识形态当作隐晦地体

现于话语中和其他社会实践中的世界观,是隐含于社会习俗的一些常识性的假设,人们一般没有意识到这些假设的存在,并根据这些假设来用语言进行互动交流。Fairclough^[18]指出,意识形态是隐晦地体现于艺术、法律、经济活动以及个人和集体生活中的世界观念,关注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中隐性、无意识的具体化过程。他接受 Gramsci^[19]的观点,认为主体是由隐含于其实践中的多样的意识形态建构的,由此赋予主体某种奇怪的复合式个性。他认为意识形态和社会活动紧密相连,并且是由其社会效应而非真理价值来判断的;意识形态领域由一系列相互冲突、重叠、交叉的思潮构成,从而形成意识形态复合体,其中各成分在意识形态斗争过程中不断被建构、重构、体现、再现;常识既是过去各种意识形态斗争效果的存储器,同时也是持续的意识形态斗争中重构的目标对象。由此可见,与 Wodak 和 Fowler 相似,Fairclough 同意意识形态是一种对世界的认知,具有常识性、隐蔽性和无意识性;与 Fowler 相似,他强调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性以及主体个性的复杂性;与 Wodak 相似,他强调一定社会领域中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和斗争的复杂性,认为常识化是意识形态的存储器和斗争目标;与前两人不同的是,他突出强调意识形态形成并体现于社会实践,不是某种先于社会实践的主观存在;不仅社会群体具有意识形态,同时个人也有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可以体现为个人生活中的世界观;同时他明确指出,意识形态的判断标准是其社会效应而非真理性,这是一大突破。

在意识形态与话语的关系上,与 Fowler 类似,Fairclough 主要关注意识形态在话语中的渗透性以及对话语的制约作用。Fairclough^[20]指出,话语的连贯性依赖于具有意识形态性的话语常识,因为语篇生成的过程中,创造者不断地累积性地把这些常识性假设强加于语篇阐释者,而创造者本身往往也没有意识到其语篇创造过程中所蕴含的这些常识性假设;语篇阐释者必须激活和接受这些假设才能理解语篇的意义。由此 Fairclough 揭示了意识形态对话语制约的机制在于意识形态的常识化,揭示其途径在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对常识化意识形态的编码与解码,这与 Fowler 十分相似。与 Fowler 和 Wodak 相比,Fairclough 的独特贡献在于深入研究了意识形态在话语中隐藏和凸显的方式。Fairclough^[21]指出,处于支配地位的话语

会经历一个自然化(naturalization)过程;自然化导致意义的封闭性(包括词语词典意义的明显的固定性以及言辞意义的明显透明性)规约性交际互动方式的不言自明性,话语主体和情景的不言自明性和话语表面上的独立性,由此支配性话语看上去会断开与特定意识形态和社会利益的关系,成为该机构的常识性惯例,从而隐藏具有的真正效果。Fairclough^[22]指出,意识形态性常识得以凸显的三种方式:一是发生交际故障、沟通有误、话语修复等情形;二是交际参与者之间足够大的社会文化差异,从而使得一方明显意识到另一方常识中的任意性和相对性;三是通过某种形式的话语干涉来故意扰乱这些常识。此外,Fairclough的独特贡献还在于,深入考察了意识形态在话语各个层面的渗透。Fairclough^[23]认为,意识形态既隐含于话语结构系统中,也隐含于具体的话语事件中。首先语篇产生和阐释过程中所使用的话语类型都隐含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其次这些话语类型在社会中组合为话语秩序的方式,以及话语秩序具体体现在话语事件中的方式都隐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语篇中词汇、句子的意义、语篇各层次的形式特征以及语篇的风格都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性。这为基于语言学理论对话语的意识形态性做深入系统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在意识形态与社会的关系上,与Fowler和Wodak有意拉开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做法相比,Fairclough^[24]明确指出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把意识形态与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对称和权力支配相联系,特别是与阶级权力和统治相联系。此外,他认为各种话语习俗和常识及其所内嵌的意识形态性假设,本质上都依赖于其背后的权力关系;而这些意识形态性假设的强加和接受反过来把现有社会关系合法化。这种对社会权力和意识形态相互之间辩证作用关系的认识,和Fowler的观点基本一致。Fairclough^[25]继承了列宁的霸权(即在某领域中合法的支配权和领导权)概念并用于意识形态研究,认为意识形态霸权通过意识形态常识化过程而获得。Fairclough^[26]指出,特定意识形态的常识化是斗争的结果,斗争形式是意识形态各异的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机构内的语言和话语秩序斗争,由此决定了不同社会群体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霸权为局部话语和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一个模式和母体,由此统治阶层总是通过建构联盟,

力图在一定程度上融合被统治阶层,融合局部的、半自治的社会机构和权力关系来行使霸权。Fairclough把意识形态霸权归因于常识化的观点与Fowler和Wodak的观点类似。但其独特贡献在于强调霸权获取和行使不仅需要支配统治阶层的力量,需要统治阶层与统治阶层之间进行话语斗争,同时也需要其它各阶层有意或无意的合作。

四、van Dijk的意识形态观

如果说前面三位学者主要从社会视角来研究意识形态,van Dijk则引入认知心理因素,提倡用社会、认知和话语的多学科三维视角来研究意识形态。van Dijk^[27]指出,意识形态既是社会的也是心理的,其心理特征在社会中获得、共享、变化;它是特定社会群体共享的、潜伏于社会知识、态度等其他社会信念体系之下的更为概括、抽象的社会信念体系;由组成意识形态图式的各种具体社会范畴(比如成员身份、活动、目标、价值、地位、资源)组织起来;而这种图式作为群体的自我图式,界定群体的社会身份和利益。van Dijk^{[28][29]}强调意识形态是社会认知的一种形式,作为一种复杂的认知框架制约着知识、意见、态度等其它社会认知以及社会表征(包括社会偏见)的形成、转换和运用。在认知上它是社会群体成员与其它社会群体相联系的一种自我图示,为特定社会群体、阶级或其它组织形式中的成员所共享,主要认知功能是组织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心理表征;从社会视角来看它是群体的自我身份识别,具有群体性的特征,其框架由社会群体相关的规范、价值、目标、原则等成分组成,这些成分的选择、组合和运用支持在社会实践中符合该群体总体利益的感知、解释和生活方式;由此意识形态赋予社会态度以连贯性,并与社会态度一起制约着社会实践,体现着依赖于利益的社会现实的建构和重构。van Dijk把社会认知相结合,既突出意识形态的群体认知和心理表征属性,也突出其所蕴含的群体的社会身份识别和利益相关性。他对意识形态内部成分的深入揭示,以及其结构上的两极性、整体连贯性和内部可变性、差异性的强调,为系统深入分析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奠定了基础。此外,与Fairclough相似,van Dijk^{[30][31][32]}强调对意识形态的评价标准并非其正确与否,而是其在管理群体思维和互动中的社会 and 认知角色(比如其有效性、有用性);他不同意某些政治学的定义,认为意识形态是一般性、非贬义的,而不是错误、扭曲或被

误导的观念 这与 Fowler 的观点基本一致。

在意识形态与话语的关系上,与前面三位学者主要关注意识形态对话语的渗透与制约相比,van Dijk 强调两者之间辩证互动但非决定性的相互关系。Van Dijk^[33]指出,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通过社会知识和态度等社会信念和个人信念间接地、非决定性地制约着社会实践,特别是话语实践;而话语在意识形态的形成、表达、贯彻、再造和变化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因为各种意识形态只有通过语言使用、话语或交际(或其他符号实践)才能得以清晰地表述。van Dijk 的独特贡献还在于详细考察了意识形态性的话语生产过程以及个体、群体和话语结构在其中发挥的作用。van Dijk^[34]认为,话语生产是复杂的社会认知过程,其中潜在的意识形态性的个体心理模型被映射到话语结构上,从而在话语结构的各个层次得以体现;在话语理解和说服过程中,各种话语结构可以被用以影响个体心理模型的形成、内容和结构,并且间接地影响社会表征和意识形态的形成、内容和结构。除了话语结构外,社会语境模型以及话语接收者的心理表征(比如已有的意识形态、态度、知识、经验模型、现有目标和个人利益等)也制约着意识形态的效应和再生,因而特定意识形态并不总能达到预期效果;只有意识形态与个人利益、经验模型等一致,且社会个体没有其他选择或能被说服时,其效应和再生才能取得成功。van Dijk^{[35][36][37]}指出,由于话语在意识形态的形成和转化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因而考察谁使用何种话语过程来控制意识形态的生成和再生方式和机制十分关键;其批评话语研究的目的就是对意识形态的形成、转换和运用进行系统的社会认知分析。一方面要厘清潜在的意识形态并说明其如何影响对现实的社会建构、如何影响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的形成和转换;另一方面也要详细分析话语结构、策略和过程及其在意识形态生成和再生中的角色。对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和再生分析需要对话语的各个层次、单位、结构、策略以及语境做系统详细的分析。与前几位学者相比,van Dijk 推进了基于话语分析的意识形态研究,使其更为系统深入,成为批评话语研究的主要目标。

在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上,van Dijk 的独特之处在于,指出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建构关系,并指出了意识形态获得个体属性的路径。van Dijk^[38]指出,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群体所

共享的,是社会群体的根本特征和群体成员共享的社会认知之间的一个接面,只有被群体中的个体成员在具体语境中的运用或实现过程中才获得个体属性;它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或文化信念,而是由满足一定标准的特定社会群体所界定的,这些群体特征标准包括成员身份、共同活动、群体互动、目标、价值规范、特定社会地位、社会资源、以及共享的社会表征等。van Dijk^{[39][40]}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般性社会功能,即标识群体身份和利益,界定群体衔接和团结,组织共同活动和互动以最大化地实现群体目标;由此意识形态解决了群体的社会性和互动性协作这个根本问题,使得个体的活动者能够作为群体成员且常常以符合群体整体利益的方式活动。van Dijk^{[41][42]}指出,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关系的管控直接相关,既可以管控支配和冲突关系,也可以管控竞争和合作关系。由此意识形态一方面可以使权力滥用和不平等合法化,另一方面也是发起社会反抗、挑战、异议和变化的基础。各种社会精英对于公共话语(特别是媒体和教育)往往享有优先接触和控制权,因而在意识形态的形成和传播中具有特殊作用,成为意识形态领袖,可以预制、激起意识形态论辩。此外,群体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和贯彻往往需要一定的组织机构形式,往往是通过政治、媒体、教育等意识形态机构来进行。因而,和前面几位学者相比,在意识形态与权力支配关系的问题上,van Dijk 不仅关注权力控制与竞争,还关注反抗和合作,并且揭示了意识形态对社会管控的方式和途径。

五、结语

Fowler、Wodak、Fairclough 和 van Dijk 等四位学者的意识形态观各有差异。Fowler、Wodak、Fairclough 主要是从社会视角来看待意识形态的本质并对其结构做初步探讨;van Dijk 则在此基础上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的社会认知本质,并深入揭示其认知图式结构。四位学者都强调意识形态概念的中立性,Fowler 强调意识形态在群体生活的自我组织和解释中的积极作用,Wodak 更为关注偏见性的意识形态,而 Fairclough 和 van Dijk 强调社会效应作为意识形态判定的标准。在意识形态与话语的关系上,Fowler、Wodak 和 Fairclough 强调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单向渗透、规范及其作用机制(即常识化)。Fowler 揭示了这种制约是通过作者和读者的价值观互动来实现;Fairclough 揭示了意识形

态在话语各个层面的具体渗透和其在话语中隐藏和凸显的方式;而 Wodak 则强调话语既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也是目标;van Dijk 强调意识形态与话语之间辩证但非决定性的相互建构关系,揭示了意识形态性话语的生产过程及其个体、群体和话语结构在其中的作用。在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上,四位学者都认识到两者之间辩证的相互建构关系,Fowler 与 Wodak 注重揭示意识形态在话语中建立和维护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方式;Fairclough 把意识形态与阶级权力不对称相联系,强调霸权的建立与行使需要统治和被统治阶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van Dijk 揭示了群体意识形态获得个体属性的路径和意识形态对社会管控的具体方式,并在关注控制与竞争的基础上突出反抗与合作。

如果我们把学者们各有异同的观点进行取长补短,可以得出批评话语分析总体的意识形态观。具体来说,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群体所共享的深层社会信念体系,是社会群体对世界中的事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认知而形成的社会心理表征,建构着群体身份和群体利益,制约着群体的社会知识和态度。其判定标准是在群体中的社会效应而非其认识论上的正确性。群体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图式结构,由身份、活动、目标、地位、资源、规范、价值等成分组成,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同时也具有内部差异性和可变性。意识形态与社会话语之间具有双向辩证的建构关系,即意识形态

由社会话语所建构,同时又渗透体现于社会话语及其语境的各个层次中,制约着群体的话语活动,随着群体话语活动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对群体话语活动的深入细致的研究,是揭示该群体意识形态的形成、效应和转换机制的基本途径。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权力结构之间也具有辩证的相互建构关系,即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由特定社会群体的话语活动所建构,同时又界定、维护着群体身份的稳定性,建构着话语活动的主体;意识形态是社会权力形成与管控的重要方式,是权力控制与反抗、竞争与合作的目标和手段。

批评话语分析的意识形态观也存在一些有待厘清的问题。首先,把群体社会效应作为意识形态的判定标准固然是一个进步,但社会效应是多种多样的,不是所有的社会效应都能作为判定标准;批评话语分析需要进一步厘清具体哪些社会效应可以作为意识形态的判定标准。其次,批评话语分析强调常识化、无意识的意识形态,然而并不是所有意识形态都是隐蔽的,其隐蔽性是一个程度问题,且在不同的社会群体成员中也有所差异。再次,批评话语分析把意识形态限定为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不太承认个体的意识形态;然而社会群体是由个体成员组成的,群体性的意识形态需要通过个体的话语活动来建构,因而对于个体价值观在群体意识形态中的功能角色需要进一步探讨。

注释:

- [1][7] R. Fowler, "Critical linguistics", in K. Malmkjær (ed.) *The Linguistics Encyclopedi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121.
- [2][4][6] R. Fowler, "On critical linguistics", in C. R. Caldas Coulthard and M. Coulthard (eds.) *Texts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 10-11, 11, 7.
- [3] R. Fowler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5] G. Kress *Linguistic Processes in Sociocultural Practice*,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6-7.
- [8] R. Wodak, "What CDA is about: a summary of its history, important concepts and its developments", in R. Wodak and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1, pp. 10.
- [9][11][15] R. Wodak,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in K. Tracy, C. Ilie and T. Sandel (eds.)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published Online: 27 APR 2015, DOI: 10.1002/9781118611463.wbielsi116, pp. 4, 4, 4.
- [10][14][16] R. Wodak and M. Meyer,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in R. Wodak and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16, pp. 7, 6, 7.
- [12] M. Reisigl and R. Wodak,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in R. Wodak and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9, pp. 87.
- [13] M. Reisigl and R. Wodak,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history, agenda,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R. Wodak and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16, pp. 27.

- [17][20][21][22][26] N. Fairclough *Language and Power* ,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 1989 , pp. 3 , 107-108 , 106-109 , 106-107 , 107-108.
- [18][23][24][25] N. Fairclough ,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 1995 , pp. 76 , 70-72 , 16-20 , 75-77.
- [19] A. Gramsci ,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 Hoare and G. N. Smith ,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1971.
- [27][30][33][34][35][38] T. A. van Dijk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1998.
- [28][31][36] T. A. van Dijk , “Discourse , ideology and context” (paper for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ragmatics , Budapest , July 2000) *Folia Linguistica* , XXX/1-2: 2001 , pp. 11-40.
- [29] T. A. van Dijk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8.
- [32][37][41] T. A. van Dijk , “Discourse and ideology” , In T. A. van Dijk (ed.) , *Discourse Studies* , London: Sage , 2011 , pp. 379-407.
- [39][42] T. A. van Dijk *Discourse and Power* ,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2008.
- [40] T. A. van Dijk ,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in R. Wodak and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2016 , pp. 62-85.

[责任编辑: 石雪梅]

(上接第 42 页)

- [14] 苏瑞波 《基于共词分析的广东与江苏、浙江、北京、上海支持众创空间政策的对比分析》,《科技管理研究》2017 年第 13 期。
- [15] Callon M. , Courtial J. J. P. , Turner W A , et al “From translations to problematic networks – an introduction to co-word analysis. Soc Sci Inf Sur Les Sci Soc” ,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 vol. 22 , no. 2 (1983) , pp.191-235.
- [16] 梁 帅、高继平 《F5000 论文评审意见的优秀论文特征识别》,《科学学研究》2017 年第 3 期。
- [17][20] 钟伟金、李 佳 《共词分析法研究(一)——共词分析的过程与方式》,《情报杂志》2008 年第 5 期。
- [18] Zhu M. , Zhang X. , Wang H. , *A LDA Based Model for Topic Evolution: Evidence from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s*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ling Sim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 2016 , pp.87-92.
- [19] 王玉林、王忠义 《细粒度语义共词分析方法研究》,《图书情报工作》2014 年第 21 期。
- [21] Callon M. , Courtial J. P. , Laville F. , “Co-word analysis as a tool for describing the network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bas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The case of polymer chemistry” , *Scientometrics* , vol. 22 , no. 1 (1991) , pp.155-205.
- [22][23][26] 钟伟金、李 佳 《共词分析法研究(二)——类团分析》,《情报杂志》2008 年第 6 期。
- [24] Law J. , Bauin S. , Courtial J. P. , et al , “Policy and the mapping of scientific change: A co-word analysis of research into environmental acidification” , *Scientometrics* , vol. 14 , no. 3 (1988) , pp. 251-264.
- [25] Leskovec , Jure , Kleinberg , et al , *Graphs over time: densification laws , shrinking diameters and possible explanations* , Kdd , 2005 , pp.177-187.
- [27] Wasserman S. , Faust K. ,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 *Contemporary Sociology* , vol. 91 , no. 435 (2016) , pp.219-220.
- [28] Borgatti S. P. , Everett M. G. , Freeman L. C. , “UCINET for Windows: Software for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 *Connections* , vol. 14 , no. 12 (1992) , pp.12-15.
- [29] 茨韦特瓦 , 库兹涅索夫 《社会网络分析: 方法与实践》,王 薇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年, 第 58 页。

[责任编辑: 黄艳林]